

中国少数民族简况

壮 族 布依族 侗 族
水 族 仫佬族 毛难族

(征求意见稿)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

662

726

中国少数民族简况

壮 族	布依族	侗 族
水 族	仡佬族	毛难族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目 录

壮 族	(1)
布依族	(17)
侗 族	(32)
水 族	(46)
仡佬族	(55)
毛难族	(62)

壮 族

(一)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有七百九十九万多人（1958年）。其中七百四十二万人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十八万人分布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还有少数分布在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和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大部分聚居，少数和汉、瑶、侗、水、苗等族杂居。

在古代汉文史籍上，称壮族的先民为西瓯、骆越、乌浒、僚等。壮族又有布壮、布土、布依、布沙、布越等多种自称。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壮族是古代百越各支系，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的。解放后，总称“僮族”，1965年把僮族的“僮”字改为“壮”，称壮族。

壮族分布的地区在云贵高原的西南部。西北面山岭延绵，西南面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接壤，境内丘陵起伏，石灰岩分布颇广，奇峰挺拔，山水秀丽。河流有郁江、江水河、柳江、桂江等，水力资源丰富。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南部夏秋酷热。四季草木常青，百花盛开。雨水充足，年降雨量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毫米。多热带、亚热带作物。农产品有水稻、玉米、薯类等。果品有龙眼、荔枝、香蕉、菠萝。经济作物

有甘蔗、油桐、油茶、八角、桂皮、楠竹，还产田七、蛤蚧等名贵药材。森林资源也很丰富，柳州一带的木材，久负盛名。地下矿藏有铁、煤、钨、锰、金、锡、锑、铝等。

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由于壮、汉人民长期以来交错杂居，联系众多，壮族人民多会汉语和汉文。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为壮族人民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壮族有很多口头文学，记述本民族的历史传说。在口头文学中山歌尤其有名，过去每逢春秋时节，各地都举行山歌对唱，叫做“歌圩”。解放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地群众对山歌作了改革，去掉了那些不健康的内容，编唱了很多革命的新山歌。

自古以来，壮族就发展了自己的文化艺术。保存和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有铜鼓、花山崖壁画和壮锦等。

铜鼓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在整个壮族地区都有发现，仅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就收藏有三百多面。铜鼓类型多种，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达一百厘米以上，重量自数十斤到数百斤不等。鼓面有浮雕花纹图案，鼓身全部有花纹围绕。用途诸说不一，有军鼓、民乐、祭乐，以及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等说。

花山崖壁画也大约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主要分布在广西西南部左江两岸的峭壁上，已发现五十多处，以宁明县花山的壁画规模最大，画面长达百余米，高四十余米，有一千三百多个人像。画面上的人像大的高三米多，小的约三十厘米，间有铜鼓、铜锣和其他动物的形象。笔调粗犷有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壮族先民的生活情况。

壮锦是壮族妇女独创的手工艺品，以棉纱为经，丝线为纬，经线一般为原色，纬线用各种彩色，可织成各种美丽的花纹图案。可做被面、台布、背带、围裙、手提袋等用。根据历史记载，唐、宋时已有生产。解放后，壮锦被列为富有民族风格的手工艺品而加以发展，生产了很多新的产品。

壮族住房与汉族大致相同。部分地区还保存着一些传统的旧式住房——高架式楼房，史书上称为“干栏”和“麻栏”，是古代百越人民的住房形式。壮族服装大部分和汉族相同。在广西西北部，壮族妇女多穿绣花滚边衣裤，腰间束绣花围腰，下身穿褶裙和绣花鞋；又喜佩戴银首饰，如发簪、耳环、手镯之类。主食大米、玉米，南部多吃糯米。壮族婚姻一般是一夫一妻制，多做地区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有“不落夫家”的习俗，解放后已逐步改变。

(二)

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它的先民曾经经历过漫长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据地下发掘和汉文史籍的记载，在两千多年前，壮族的先民就已经会铸造铜鼓及其他铜器，进入了铜器时代。与此同时，社会已出现了贫富的分化，权力的悬殊，产生了君、王、将、相的统治阶级和“男子耕农，种禾稻紵麻，女子桑蚕织绩”的被统治阶级。这时，已是明显的阶级社会了。又据历史记载，壮族的先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我国南

方的楚国有着密切的联系。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岭南设置了郡县，从此，壮族地区就成为中原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秦始皇大量移民岭南，派史禄凿通“灵渠”，沟通了湘、漓二水，更加密切了壮族地区同中原地区的联系。秦始皇在壮族地区的施政措施，对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对壮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都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到九、十世纪（唐末宋初）时，壮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农业以种稻田为主，已大量使用牛耕，引水灌溉，耕作技术已达到“深耕溉种，时耘时耔，却牛马之践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以粪土，而有秋之利，盖富有年矣”的程度。（柳宗元：《河东先生龙城录》卷下）故有“稻粟皆再熟”，“种稻似湖湘”，“粮粒丰储”，“猪牛鸡鸭肥大蕃息”的景况。手工业生产有铜、铁、纺织等，特别是练子布和壮锦的生产，当时已闻名于全国。大致在这一时期，大部分壮族地区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其主要标志是：土地是“富豪”，即封建官僚和地主掠夺兼并的主要对象；占有土地的多少是衡量贫富的主要标准；盛行土地买卖和租佃、典当等关系；富豪人家死后不是以奴隶殉葬，而是用田地契约同葬；生产者在法律上已经不能任意屠杀，掠夺和买卖；有旧主，佃主和佃户、佃客、自耕农、雇农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存在等等。在“羁縻”州县地区（今桂西和桂西南的一部分），尽管社会发展比较缓慢，但根据宋代王安石和范成大的记述，在宋代时，这些地区也已进入早期封建社会了。表现为这些地区的全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为“酋首”、“主户”等土官所占有，他们是封建领主；人

身依附于土官，耕种土官的“份地”，并给土官提供生活资料、服各种劳役的，是总称为“峒丁”的农奴。这一时期的壮族地区，特别是“羁縻”州县地区，还存在着相当比重的奴隶制度，例如流行奴隶买，卖借债要以人身作抵押，到期不还，就被没为奴隶；还有掠夺奴隶等等。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壮族地区的主要社会矛盾是广大农民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封建制度与残存的、并时刻妄图复辟的奴隶制度之间的矛盾。在这些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便爆发了农民（包括农奴和奴隶）起义。如八、九世纪时的西源州（今扶绥）人民起义和十一世纪初的宜州（今宜山）人民起义、抚水州（今武鸣一带）农民反饥饿斗争等，就是其中规模比较大的起义事件。这些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

唐代著名的法家柳宗元，于公元815年到柳州做刺史，他一到任就下令废除当地买卖奴隶和用人身作抵押的“乡法”，统一执行中央王朝的法令，而且不分民族，一律根据法令来判定“曲直”。这些措施，对壮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十五、十六世纪（明代）以来，由于全国已经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阶级矛盾较前更为尖锐，壮族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剧烈。在一般州县地区，官僚、豪绅、地主肆无忌惮地强占民田，造成“望中阡陌田，尽是豪家霸”的土地集中现象，而广大壮族农民多沦为佃农，过着“男子为乞化，女子准为婢”的悲惨生活；在土州县地区，还残存着落后的农奴制度，中央王朝通过土官来实行统治，土官享有种种特权，贪财如命，野蛮绝伦。土民在残酷的压迫剥削

下，“终身不见天日”，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壮族人民为了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连续发动了十多次农民（农奴）起义，例如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古田（今永福）佃农起义，六、七十年代的府江（平乐县以下的桂江）农民起义和八十年代的广西田州（今田东）、贵州南笼厅（今安龙）壮族、布依族农民起义等。所有这些农民起义，都有力地打击了腐朽的封建制度，特别是打击了残存的农奴制度，有利于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三）

鸦片战争后，壮族社会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始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基本矛盾也转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入壮族地区的同时，封建地主豪绅又在极力榨取农民的血汗，兼并农民的土地。例如平南县的地主占有全县耕地面积的80%以上，桂平县金田地区四个村，90%以上的土地为地主所占有。丧失土地的农民备受地租、高利贷及其他封建剥削，租额、利率日益增加。鸦片战争后，桂平县太宅里地区的租率由原来的“百种千斤”（即一百斤种子的田地，大约合十市亩，租谷一千斤），增加到“百种二千斤”，贵县的租额由原来的四成、五成，增加到六成、七成。

外国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迫使壮族人民和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中国近代史上名闻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爆发在广西壮、汉、

瑶族杂居的地区。

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以前，广西地区曾先后爆发过许多次小规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后，壮族人民积极拥护，大力支持，并踊跃参加了革命的队伍。据调查，当初参加金田起义的壮族人民多达数千人，占到太平军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太平军在广西期间，壮族劳动人民是它的基本群众；太平军离桂北上后，许多壮族人民随军北伐，转战各地，一直是太平军的基本骨干，有的成为太平军、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如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林凤祥、李开芳等，都是壮族。勇敢善战，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太平军女军，多是广西壮、瑶等少数民族的劳动妇女。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继承了以往反动统治者的衣钵，利用孔孟之道做为他们压迫奴役各族人民的思想武器，拼命宣扬孔老二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把农民起义污蔑为“犯上作乱”的“匪逆”。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为了粉碎反动派的思想武器，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针锋相对地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孔运动。他们在广西壮族地区和壮族人民一起，烧毁了大量的《四书》《五经》，宣布它们是“妖书邪说”，捣毁孔庙，批判孔老二鼓吹的“上智下愚”、“男尊女卑”等反动思想。他们的革命行动，不仅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壮大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以后广西各族人民进步思想的传播，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太平军离开广西以后，广西壮、汉等族人民继续斗争，

前赴后继，几乎没有间断过。规模较大、影响比较深远的起义事件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大成国”农民革命运动，李锦贵（壮族）等人领导的上林（今上林）起义；吴凌云（壮族）等人领导的太平府（今崇左）起义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黑旗军”的“抗法援越”武装斗争和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反清运动在广西的斗争，都有广大的壮族人民群众积极参加。这些斗争有力地震撼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充分表现了壮族人民和邻近各族人民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段历史时期里，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在壮族地区进行黑暗统治的，是桂系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在这期间，帝国主义更加密切地和封建主义勾结起来，一方面大量地倾销商品，一方面以廉价搜刮各种原料，这不仅加重了对广大农民的剥削，而且严重地破坏了壮族农村和城镇的手工业生产。桂系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壮族和各族人民的压迫剥削是极其残暴的，他们发展反动武装，组织反动机构，横征暴敛，强取豪夺，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使壮族和各族人民终年挣扎在死亡线上。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反动派也不能把它逆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壮族地区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1922年广西红水河两岸，由韦拔群同志（壮族）领导，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1925年，广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1926年6月，中共广西特委宣告成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工作，1929年12月11日，爆发了著名的百色起义。这次起义推翻了桂系军阀在右江地区的

反动统治，建立了有汉、壮、瑶等族代表参加的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同时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1930年2月1日，党领导的另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在龙州起义，推翻了桂系军阀在左江地区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有汉、壮、瑶等族代表参加的左江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

1930年秋，红军主力奉命北上以后，以壮族战士为主的红二十一师，在师长韦拔群和政委陈洪涛的领导下，在右江地区人民群众和自卫队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抵抗了由帝国主义直接支持的数万反动军队，坚持斗争达两年之久，狠狠地打击了桂系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后因众寡悬殊，经过激烈的战斗，部队遭到重大的损失，优秀的共产党员、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陈洪涛两同志先后壮烈牺牲，革命形势暂时地转入低潮。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壮族地区的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东兰县西山山区的党支部始终没有被摧垮。1935年，中共右江特委和各地党组织相继恢复，在抗日战争期间，有力地领导壮族和各族人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1947年，广西各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普遍发动了武装起义，开展了人民游击战争，积极配合各地人民解放军作战，到1949年上半年，相继解放了广西的四十二个县区域镇。1949年底，广西全境解放。从此，壮族人民彻底粉碎了套在脖子上的千年铁锁链，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罪恶统治下解放了出来。

(四)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壮族人民和汉、瑶、苗、侗、仫佬、彝、京等兄弟民族人民一起，投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1953年，壮族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并转入了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到1957年上半年，99%的壮族农户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实现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政治战线上，1957年，党领导壮族人民和各族人民进行了整风、反右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1958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照耀耀下，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大跃进，壮族地区迅速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壮族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从1952年开始的。1952年12月9日，在广西的西半部建立了桂西壮族自治区，1956年根据宪法规定，改为自治州。1958年3月5日，桂西壮族自治州撤销，建立了省一级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同年4月1日，在云南建立了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1959年3月12日，在广东又建立了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壮族各级民族区域自治机关的建立，实现了壮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大大有利于壮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也有利于区内壮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友好团结和共同繁荣。

必须指出，壮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壮族地区极力推行

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国内外阶级敌人串通一气，里应外合，从各方面干扰破坏壮族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刘少奇一伙曾掀起了“大砍合作社”的右倾妖风；在实现人民公社化后，他们又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反革命黑货，妄想复辟资本主义。但是，壮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不断粉碎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壮族人民狠批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空前提高。1968年8月，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风暴中，成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等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先后成立，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正当全国人民继续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时，林彪却跳了出来，疯狂地反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宣扬“天才论”和“上智下愚”等谬论，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壮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又投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修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壮族人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紧密联系实际，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极右实质，狠批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有力地促进了壮族地区工业、农业、文教、卫生及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五)

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翻了身的壮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短短的二十几年中，创造了以往几百年、几千年所做不到的奇迹，整个壮族地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壮族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在解放前，由于封建制度的长期统治，广大壮族劳动人民终年辛勤劳动，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农业生产十分落后。水稻亩产仅一、二百斤，玉米亩产仅七、八十斤，粮食不能自给。

解放后，天是一样的天，地是一样的地，可是人们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农业生产的形势就彻底变了样。经过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1952年，广西粮食总产量达九十四亿斤，比解放前的1949年增长了40%以上；实现合作化以后的1957年，达到一百零八亿斤，在1952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15.9%。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粮食总产量1957年也比1952年增加了151.4%。经过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农业发展得更快，南宁地区1949年时，粮食总产量为十二亿二千万斤，到1969年，整整翻了一番，然而更快的发展速度是从1970年到1973年，在这四年里，粮食年年大幅度增产，1973年比1970年增产额即达十二亿斤。无论广西壮族自治区还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大革命以来有很多县、市粮食亩产超过了《纲要》，有不少公社、大队亩产超过了千斤。广西田阳县那塘大队，从

1966年起就亩产超千斤；1971年是大丰收；1972年虽然遇到多种自然灾害，仍然夺得了粮食平均亩产一千七百五十斤的大好收成，总产量比1971年增加了二十四万一千斤，平均每人产粮二千二百三十七斤；1973年又喜获大丰收，平均亩产达一千七百七十八斤，比1972年每亩又增长了二十八斤。

广大壮族人民认真贯彻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发挥了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兴修水利，改造农田，仅1971年到197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新增早涝保收农田四百五十一万亩；从1972年到1973年底，全自治区完成大小水利工程四万三千多处。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各种农业科学实验组织遍及农村。林、牧、副、渔各业也都获得了相应的发展。

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掠夺下，广西壮族地区丰富的工业原料和地下宝藏得不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文山壮族地区的工业，更象一张白纸，除文山城内有六台古老的手工织布机外，再也找不到任何机器。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壮族地区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1959年时，广西的工业总产值已达到四万二千二百多万元，比1952年增长了十三倍；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也达到四十八万五千多元，比1954年增长了四点九倍。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壮族地区的工业生产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柳州市1972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六十多倍，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加了一点四七倍。南宁市1972年的工业总产值比解放初的1950年增长了八十八倍。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也先后建立起机械、电力、冶金、煤炭、水泥、木材、玻璃、造纸、纺织、榨糖、食品等工业。尤其

可喜的是，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进一步扩大，生产水平也有了进一步提高。1958年兴建的柳州拖拉机厂，1965年的年产量只有五十台，文化大革命中，全厂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创造了四百多台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组成了一条流水作业线，使产量有了新的飞跃，质量也有显著的提高。1972年拖拉机年产量达到一千零一台，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十九倍。

壮族地区的交通运输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郁江、柳江、桂江、红水河等河道、大部可通航。铁路有湘桂、黔桂、黎湛等线。民航飞机可通往北京、昆明、广州及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内。公路交通已通到各县和大部分公社；文化大革命以来到1972年底、广西新建公路一万一千多公里，新架设公路桥梁二千二百多座。现在，每个公社都有邮政所，大队通电话，村村有广播喇叭，大家可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

壮族是一个文化发达较早的民族。但是，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文教事业非常落后。解放后，文教战线又受到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虽然数量上也有不少发展，但质量比较低。文化大革命以后，遵照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教导，狠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特别是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和科研单位后，文教战线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壮族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上山下乡，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思想路线觉悟不断提高。

壮族地区的九所高等院校，于1971年起招生复课。工农兵新学员入学后，认真读书，深入批判修正主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各高等院